

西南師範大學

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

治學紀事

• 劉又辛 著 •

巴蜀書社

香港中文大學

國際漢文學研究團體

治學紀事

· 第五期 ·

成文書局

西南師範大學

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

治學紀事

劉又辛 著

巴蜀書社

中國·成都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治學紀事/劉又辛著. — 成都:巴蜀書社,
2002.3

ISBN 7-80659-331-4

I. 治... II. 劉... III. 訓詁-文集②治學方法-
文集 IV. H13-53 G795 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2)第 015922 號

策劃組稿:汪啓明

責任編輯:楊宗義

封面設計:李文金

治學紀事

劉又辛 著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

(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)

總編室電話(028)6656816

發行科電話(028)6662019

新華書店經銷

成都金龍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張 5.375

字數 130 千

2002 年 3 月第一版

200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1-1000 冊

ISBN 7-80659-331-4/H·24

定價:15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



西南師範大學

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◎ 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 | 喻遂生 |
| ◎ 上古漢語語法研究 | 方有國 |
| ◎ 《韓非子》單音動詞語法研究 | 徐適端 |
| ◎ 《釋名》研究 | 李茂康 |
| ◎ 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 | 歐昌俊等 |
| ◎ 漢語動物命名研究 | 李海霞 |
| ◎ 語言文獻論集 | 蔣宗福 |
| ◎ 語文辭書補正 | 毛遠明 |
| ◎ 漢字學概要 | 徐志奇 |
| ◎ 訓詁學新編 | 毛遠明 |
| ◎ 四川方言詞考釋 | 蔣宗福 |
| ◎ 川北方言研究 | 高廉平 |
| ◎ 納西東巴文研究叢稿 | 喻遂生 |
| ◎ 治學紀事 | 劉又辛 |

西南師範大學

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

主編	喻遂生	汪啓明
學術顧問	劉又辛	
編委	毛遠明	蔣宗福
	方有國	李茂康
	段志洪	何志華
	楊宗義	

目 錄

我和文字訓詁學·····	(1)
我這二十年·····	(22)
羅莘田先生的訓詁學研究·····	(32)
沈兼士先生文字訓詁研究述評·····	(37)
聞一多先生講《詩經》·····	(54)
懷念羅庸先生·····	(58)
《漢語史論文集》前言·····	(81)
談談漢語詞源研究·····	(85)
怎樣培養漢語史研究生·····	(101)
吳秋輝《說經》序·····	(111)
《音韻學論著五種》序·····	(117)
《漢語結構類型演變新論》序·····	(120)
《漢字漢語中國文化論集》序·····	(124)
《重慶方言詞解》序·····	(128)
《左傳詞匯研究》序·····	(132)
《上古漢語語法研究》序·····	(138)

漢語同族複合詞的構詞規律·····	(142)
憶亡妻·····	(157)
編後語·····	(166)

我和文字訓詁學

—

我原名劉錫銘，字又新，後改爲又辛。1913年4月出生在山東省臨清縣城南的一個村子裏。父親舊制中學畢業，相當於現在的高中。在那個地區（現屬聊城專區），那時算是最高學府了。他終生從事小學教育工作。抗戰期間，曾把家中僅有的三間正房捐出創辦了一所武訓學校的分校。他教過的學生，有不少人長大成材。

我的啓蒙老師就是父親。父親的知識面很寬，新學舊學都能教，又善于規劃教學次序。舊學中的四書五經，先教《孟子》《論語》，再教《詩經》。新學國語課中的“大狗叫，小狗跳，大狗叫一叫，小狗跳一跳”那樣淺陋可笑的課文，祇是一讀而過，但對於1920年纔推廣的注音符號，則讓學生完全學會。記得有一次上國語課，他用注音符號寫出一篇文章，讓學生“翻譯”成漢字。那天正值縣裏一位督學先生來“查學”（檢查教學），看了黑板上一大篇注音符號，竟然一個也不認得，下課後竟然悄悄地

問父親，你們這裏還學英文嗎？一時傳爲笑柄——我想這種訓練，也許是我一生終於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一點契機吧。

我是個愚笨的人，記憶力差。二弟比我小三歲，比我聰明得多，幾百字的書，他讀上一兩遍就能成誦，我却要讀十幾遍纔行。父親針對我這個缺點，要我養成苦讀的習慣。每天早上一醒，還沒有起床，就在被窩裏回答父親的提問。在走向學校和從學校回家的路上，父子三人，一問二答，一分鐘也不放過。平時無假日，祇是過舊年時休息一天半。這種訓練對於我有兩方面的影響：一是養成勤奮學習的習慣，知道勤能補拙的道理。二是身體不好，自幼多病，但後來也因此而積累了一套祛病健身的知識。

初中畢業後，本打算到濟南去考師範學校的，因爲父親一人支持一個破敗的八口之家，又要供給比我長三歲的叔父讀書，實在不能再供我讀高中了。那時讀師範，衣食住完全公費，自己祇要籌點零用錢就行了。却蒙一位同班好友盛情約我一同去北平讀高中，學費由他負責，因此我便讀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學，隨後在1934年考上了北京大學。

那一年，胡適任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。中文系語言組的劉半農、白滌洲兩位先生相繼去世，便請羅常培先生來北大（那時他在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研究員）任教，隨後任系主任。在中文系任課的老師有胡適、沈兼士、唐蘭、聞一多、魏建功、羅庸、鄭奠、錢穆、顧隨、何容、陳綿、馬裕藻、余嘉錫諸先生。

初入學時，我暫定讀中文系，按照當時的規定，第二年可以轉入文學院的其他系。一年級的課程，多數課是文學院各系的共

同必修課，因此每周總要上兩次一百多人的大課。胡適的“中國文學概要”和“中國哲學史”，錢穆的“中國通史”都是大課。專業課祇有十幾個人，同班同學祇有十六個人，但是羅常培先生的“語音學”，課堂裏常常坐滿了人。因為北大有個特殊的校風，不但外系的學生可以來旁聽，校外的人也可以來。經常來聽羅先生講課的，一位是外語系的教員袁家驊先生，一位是清華大學楊樹達先生的研究生張清常。還有一兩個日本人。羅先生對這些旁聽生一視同仁，有的後來成為知名的語言學家。

在北大這三年，我學到的東西很多，最主要的是找到了理想的崗位，立志在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和探討傳統文化方面做出貢獻。這完全是受了幾位老師的教導和影響以及北大校風陶冶的結果。

胡適的兩門課我都聽過，他給我的最深印象是學貫中西，能够用中西對比的方法講解中國文學和古代哲學中的許多疑難問題，深入淺出，很有吸引力。他的《白話文學史》和《中國哲學史》在當時都是創新的工作。他從五四運動的前綫退出來，轉向“整理國故”，專門研究中國傳統文化，在這方面是很有影響的人物。

羅常培先生的語音學，給我印象最深，他用歐洲語音學的方法講述漢語音韻問題，許多傳統小學家說不清楚的，一經分析，無不渙然冰釋，令人頓悟。一向被視為“絕學”的中國音韻學，竟然講得那樣生動，因而我也逐漸迷上了這一門課。我在二年級時，還做了兩篇分析臨清音系的小論文，在《讀書周刊》（北大文學院主編，天津《益世報》副刊）發表。羅先生對我後來決定研究語言學，對於我終生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不動搖，產生了決

定性的影響。

沈兼士先生的文字畫理論和“右文說”等訓詁學理論，唐蘭先生的“三書說”理論，魏建功先生在《古音系研究》（講授“中國音韻學”時的講義）一書中提出的上古漢語中的音韻、訓詁問題，都使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。

當時分五段開設的中國文學史，我祇聽過羅庸先生講的兩段，都極精彩。顧隨先生講宋詞，不但妙趣橫生，而且加上手勢表情，頗能引人入勝。陳綿先生的“話劇實習”課，除講課外，還組織了一個小小的“干嗎劇團”，這點知識在抗戰初期一度派上了用場，我做過一個抗戰劇團的團長兼導演。

聞一多先生講的《詩經》《楚辭》兩門課都聽過。那是聞先生第一次講這類課，搜羅資料豐富而較少發揮。後來我到西南聯大復學，又重聽聞先生講《詩經》，因為他考察過雲南少數民族的民歌、歌舞和民俗，用以同《詩經》中的詩篇對照，于是把這項研究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。他把《詩經》講活了。這是後話。

錢穆先生的“中國通史”課，不但引發了我對歷史學習的興趣，還使我學會了做學問的某些方法。錢先生自學成才，三十多歲當小學教員時立志做學問，他說，一部《史記》讀過十幾遍，每讀一次都從這部書中解答一個大問題，中國古史中的許多大問題都是這樣得到解答的。有一次他說，從立志治學，十多年來祇有三天沒有看書，一直沒有間斷。這些話我至今記憶猶新。

北大還有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，當時學生人數不多，讀綫裝書的人更少，每人可以佔用一張能坐十幾人的大書桌，一次可以借閱幾十部書，不用任何手續；下班時可以把書籍連同自己的筆記、卡片留在原處，不會有人移動。管理員的水平也高，你祇

要告訴他書名，幾分鐘就把書送來；而且有時會主動告訴你，這書還有另外幾種版本，如果需要，馬上取來。當時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好，記得我在二年級時曾發表過一篇關於王若盛的小論文，魏建功先生看了立即給我寫信，說北大圖書館的石刻拓片中有王若盛的墓碑資料。這件事也可說明北大學風的一個側面。

但是我的治學夢被盧溝橋的炮聲打斷了。1937年7月7日我在北大東齋聽到西南方向的炮聲。中華民族面臨着生死存亡的關頭。我也被迫休學，在家鄉曾參加了一段抗戰活動。先是悲觀失望，認為生為亡國奴，不如死為自由鬼。後來親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樹敵過多，中國民心振奮，逐漸得到了日本必敗的想法，而且聽說北大已經遷到雲南，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，於是決心到昆明復學，重溫治學的舊夢。1943年從山東到雲南，逃出淪陷區，到了西安，隨後又得到朋友資助路費，第二年方到昆明。接着是抗戰勝利，西南聯大解散，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校復員後，剩下一個師範學院，改名為昆明師範學院，由三校負責配備各系教師，算是三校在昆明的分校。羅庸先生擔任第一任中文系主任，我被分配擔任大一國文、國語語法和音韻學三門課程，經常在中文系主任編的語文副刊上寫論文，後來又由傅懋勉先生帶頭組織，創辦了《雲南論壇》雜誌，由羅庸、錢穆、方國淪、董庶、傅懋勉和我任編輯。就這樣，我重新開始了治學的道路。

解放後因探望羅庸先生的病來重慶，以後竟留在這裏工作。1952年院系調整到西南師範學院（今西南師大）任中文系教授，直至于今。我同當時許多人一樣，懷着一種民族新生的興奮感參加工作。我根據當時的工作需要，講授現代漢語。但在昆明的幾年興趣已傾向于文字訓詁的鑽研，因此這兩方面都要兼顧。1955

年我參加了現代漢語規範化會議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會議。1956年參加了高教部召集的現代漢語教學大綱研討會，由黎錦熙先生任組長，陸宗達、蕭璋、張志公、劉世儒諸先生都在小組中，主要討論語法體系問題，後來幾經修訂成為中學漢語語法的暫行體系。1955我還帶去了《從漢字演變的歷史看文字改革》一文的初稿，丁聲樹、魏建功兩位先生看過後加以肯定，後來交給周定一先生（比我晚一年的北大同學，當時任《中國語文》主編），1957年發表。這是我關於文字發展史的第一篇有影響的論文。我當時還是四川省推廣普通話的負責人之一。

在那幾年，我忘寢廢食地工作、備課、寫講義、研究漢字史、寫文章，簡直不知疲勞。但是，到了1959年，在那次“擴大化”的反右運動中，竟被“擴大”成右派，被無中生有羅織了八大罪狀，于是我被陷入絕境。1962年重新任教，奉命改教三個班的習作課，還擔任一個進修班的“毛主席論文研究”和“魯迅雜文研究”課。我已洞悉這是個陷阱，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，要在這類敏感的課程中找出口實，那是非常容易的，但是在帶着枷鎖的跳舞中，我仍然認真研究，寫出了《現代漢語論文語言的發展》一文的初稿，完成了一本關於習作的講義。隨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理所當然地又一次被迫離開講臺和研究。這十年我祇得重新鑽研中醫，在批斗喘息之餘竟做起了業餘醫生，至今我還保留着幾十本尚待整理的醫案。1976年我開始進入《漢語大字典》的編寫籌備工作，後來成為編委，有幸重新回到文字訓詁的舊業中來。因為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已經思考過多年，重理舊業並不困難。為了編好這部大字典，我寫了有關整理異體字、處理同源字、處理假借字等問題的七八篇論文，還給參

加大字典工作的青年同志寫了一本講稿。1982年我招收第一屆研究生，到1987年奉命退休培養了四屆共九名漢語史碩士研究生，這些學生都能堅守教學和科研崗位，沒有一個人“下海”，有幾位已經頗有成就。1985年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在武漢舉辦第三期音韻學研究班，1987年在西南師大舉辦第四期研究班（改名為古漢語研究班），共招收全國講師以上的學員近一百多人。我按照嚴學窘學長的“將令”，講授訓詁學。研究班的學員，有好多位成為各地高校古漢語一類課程的主要教師，有的在出版社成為這一領域的骨干。1985年我把幾十年來有關文字訓詁的論文選出三十篇，編成《文字訓詁論集》一書交給中華書局出版。這幾年我先後寫出《通假概說》《訓詁學新論》兩部書，交巴蜀書社於1988年、1989年出版。

退休後，我給自己擬了一個規劃：一是要寫出“漢字發展史”，這是我思考鑽研了大半生的一個課題。二是同我的學生合寫一部漢語史。這兩部書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一部書。前者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，由我和方有國合作，已經完成，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。後一規劃，已經着手撰寫的，有我和張博合著的《漢語詞族譜》，已有十幾個詞族脫稿。方有國、馮英合寫的《上古漢語語法研究》也寫出了幾十篇論文。“詞匯史”要等一等，將來由張博完成。還應該有一部文學語言史，我自己估計已很難完成。我的忘年好友段啓明教授和夫人毛秀月，一位是紅學專家，一位擔任語言學概論課多年，他們二位願從事這項研究，希望能夠實現。

另外，還打算寫一部關於《論語》的書，姑且定名為《論語選注》吧，因為近七八年來不斷給研究生講“古代文獻導讀”

課，《論語》一書講了好多次，每次都有訓詁上的新發現，近年來孔子也得到“平反”昭雪，如何汲取孔子及其他古人的思想精華，古為今用，用以豐富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，已成為研究中國文化的學人不容推卸的責任。因而在我能動筆的時候，把這部書寫出來。因為我懂點中醫，也懂得一點中國的養生之道，很多朋友希望我寫個小冊子供大家參考。這個建議我也樂於接受，不過得往後拖一拖。

以上是我一生的大致情況。

二

現在談談我在文字訓詁學方面有哪些“創新”的地方。

孔子提出來“溫故而知新”這個命題。一切學術都是人類知識的積累，都是“故”，“故”就是前人已經發明發現了的知識，當今及以後的人要在“溫故”的基礎上創新，有所前進，有所發展，這就叫“知新”。這樣，這門學科纔會發展。反之，學術就停滯，僵化。但是，“新”要有個標準，不是有異於前人論說的說法都是新。“新”是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，前人沒有發現，你發現了它，而且經過實踐的檢驗，證明了這個發現，這纔叫知新。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在幾十年研究中的一些“新”說，是不是符合這個標準，還不敢說，這裏暫且列舉出來，希望對這類課題有興趣的朋友加以檢驗。

第一，關於假借字的問題。

假借字是漢字六書中的一類，自從許慎加以解說以後，歷代小學家經常討論這個問題，清代戴震的“四體二用”說，認為假

借字不是造字法，是“用字法”；于是又產生了引申假借、借形、借義、通假等說法。近代學者又有人認為古人用假借字為寫別字，又有人還分假借和通假為兩類不同的字。對於這些議論，我探索思考了多年，後來寫在《論假借》一文（載《羅常培紀念論文集》，商務印書館 1984 年出版，又拙著《文字訓詁論集》頁 36—61），後來又寫成《通假概說》一書（巴蜀書社 1988 年出版），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，我得到的結論是：一、假借字利用表形字當作記音符號用以記錄與之同音的詞，是人類文字發展的一個飛躍。一切古文字，如埃及聖書字，蘇美爾楔形文字，中國的甲骨文、金文，都有大批假借字，甚至是這些文字體系中的主要因素。這是文字從表形向表音發展的標志。二、許慎給假借字下的定義是“本無其字，依聲託事”八個字，說得極是。法國學者一直到十九世紀纔對埃及聖書字解讀成功，他們把假借字叫做“畫謎”（rebus），布龍菲爾德的《語言論》纔有了較切實的闡述。三、許慎的解說也有缺點，他誤把“令”、“長”兩字當作假代字，又把真正的假借字“來”、“西”等字解為會意字。祇講字本義，不講假借義。四、戴震的“四體二用”說認為“假借”和“轉注”是用字法，把假借排除在造字法之外，這同漢字體系的構成和漢字的演變都不相合。五、上古漢字中假借字所佔比例最高，假借字是表音文字初級階段的標志，因而我把秦以前的文字定為表音文字階段，在世界文字體系中，屬於初級表音文字階段。我認為，經過這番探索，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，如假借和引申、假借和通假、形借和義借、用字和造字等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

第二，關於漢字發展三階段的說法。